

在南京博物院,一座明代鎏金藏式佛塔引人注目。佛塔于上世纪50年代,在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出土,是明代佛教工艺绝品,也是国内目前唯一出土的一件“迷你型”鎏金喇嘛塔,在它的背后,可能还藏着一段我们不曾知晓的历史。

### 弘觉寺惊现地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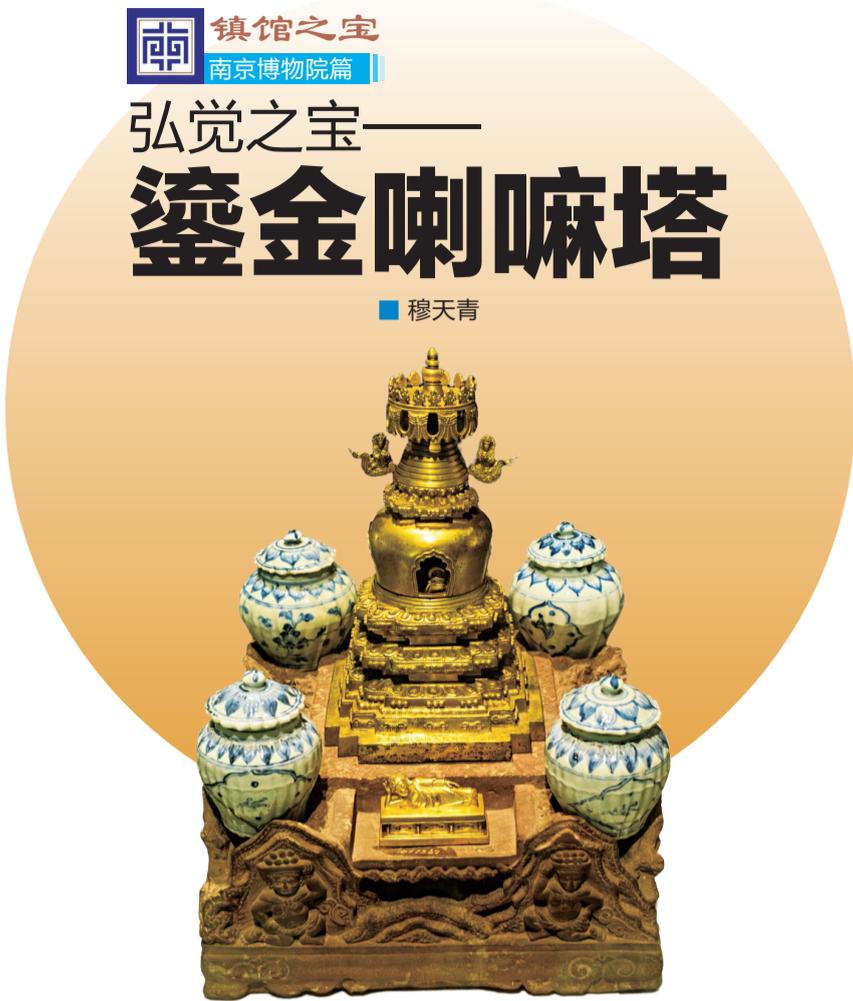
弘觉寺塔位于南京南郊牛首山的东峰西南坡,始建于唐大历九年(774年),是代宗“感梦敕修”,于明正统初年(1436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之间重建。在清代乾隆年间,此塔部分木结构遭雷击而焚毁,仅存塔身部分。

1956年,当时南京的弘觉寺塔还属于祖堂山精神病院。7月14日这天,有游客来到弘觉寺塔的底层参观时拿脚踩地,他所处的位置正是塔内正中央,当时他感到脚下地面发出了一种空洞的声音!

南京博物院得到了消息后,立刻组织人员打开前往勘察,发现在该塔底层中央有一地宫,原盖已被揭起,洞深1.06米,上圆下方,底边为83.5厘米,其中藏有文物。在1956年第11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内发现文物》一文,记载了当年从地宫中出土的文物。当年从地宫中出土了铜器、玉器和瓷器等十多件文物。其中1件盛放骨灰的铜鎏金喇嘛塔底座上,正面刻有铭文: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则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

### “迷你”宝塔弥足珍贵

鎏金喇嘛塔高35厘米,座高16厘米,比例适当,结构严谨,鎏金光亮。塔身形状像一个倒扣着的钵,所以又称“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喜用的形式,俗称“喇嘛塔”。此塔属于佛教密宗的塔式,主要供五方佛或者埋



镇馆之宝  
南京博物院篇

## 弘觉之宝—— 鎏金喇嘛塔

穆天青

葬佛舍利。

这尊鎏金喇嘛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座正面刻有二力士像,右刻双狮戏球,左刻双鹿斗角,后刻云龙,塔座下方刻有题记,记载制作喇嘛塔的制作者和供养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内部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塔身有四个壶门,塔内放置有释迦、韦陀佛像等,塔刹由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组成。须弥座上的四角各放一个青

瓷罐,其中一个罐内放有一颗老年人牙齿及骨灰等物。

在国内,金刚宝座塔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比较典型的大部分是明朝以后修建的,主要在山西五台山圆照寺塔院、北京西郊真觉寺、碧云寺、玉泉山锥子塔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五塔寺等。像这种在明代及以后修建的金刚宝座塔存世不多,而用石座、铜塔、瓷罐合成的“迷你”金刚宝座全国仅此一座,弥足珍贵。

### 争议不断的塔主人

鎏金喇嘛塔的出现引起了轰动,因为李福善的名字关联到了另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郑和。郑和七下西洋,创下壮举,但其死后埋在哪里却是个谜。

1964年的《江宁文物简志》中披露牛首山的一座墓葬可能是郑和墓。此墓坐落在一名为“回回山”的山坡上。1981年,有关部门对“回回山”明代古墓进行了勘察,不久,江宁县文教局将这座古墓修缮一新,正式认定为“郑和墓”,修缮后的“郑和墓”上刻“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之墓”字样。由于当年指认“回回山”古墓是郑和墓主要依据村民的传说和推测,也没有发现证明此墓是郑和墓的文物,因此学界引起了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这座“郑和墓”至多只是郑和衣冠冢。

郑和出生于“哈只”世家,多次参与建造寺院、布施佛寺、印造佛经、求人题记等。郑和在20多年间先后施印大量佛经,并曾皈依佛门,使用过“福善”“福吉祥”两种法号。因此有研究人员指出,弘觉寺地宫可能是伟大航海家郑和的归葬地,“李福善”就是郑和,鎏金喇嘛塔内藏着的牙齿、骨灰,极有可能属于郑和。

不过,这个石破天惊的说法并没有在明史学界、郑和研究界得到赞同。后来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铭文中的“李福善”其实是与郑和同时期的御用监太监李童。李童曾经法号李福善,他比郑和小18岁,他们一起侍奉了三位帝王,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历程,李童与郑和共事多年,情谊深厚,而鎏金喇嘛塔很可能是李童捐赠的。

鎏金喇嘛塔背后的秘密或许需要更多的发现才能揭开,但它精致的设计体现出中国明代工匠高超的技艺。这件庄重典雅的佛塔,为专家学者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宗教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 仰韶遗址:百年考古激发巨大民族自豪感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今年8月,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的仰韶村遗址,在时隔40年后再次启动发掘,为中外学界瞩目。

1921年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抬头可见巍峨的韶山,故得名“仰韶”。与周边村庄相比,其最醒目的“地标”,是一座外观以当地出土陶器为原型的博物馆。村里至今保留着一座老旧的小院,除了部分房屋坍塌,大致还保持过去的模样,100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此考察时就借住在这里。

“父亲给我大姐讲过,有个外国人在家里住过,还邀请他去过北京。”房子的主人、79岁的村民王二保回忆。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因自己家庭与仰韶文化发现的些许关联而感到荣耀。

走进仰韶文化博物馆,有一张安特生在仰韶村考察的老照片,照片上除安特生和助手外,还有两名本地人,其中一个就是王二保的父亲王兆祺。安特生在《黄土儿女》一书中记述,当时王家家境较好,有空余房屋,他先后借住了43天。

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来到

仰韶村。在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中,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专家学者经过研究论证,一致认定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正值乱世动荡中的仰韶村迅速名扬天下,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圣地。

“‘仰韶文化’是中国出现的第一

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它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所谓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不攻自破,强烈冲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现代考古学就此在中国正式发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迎来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科学揭秘时刻:殷墟、

良渚、二里头、陶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卓越成就。

“考古学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让更多中国民众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解自己的民族、国家、文明如何走到今天,为今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解读考古的价值。

100年来,现代考古学一次次以科学的调查发掘,系统地、完整地向世界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深刻改变了国人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激发起中华民族巨大自豪感。仰韶,这一我国重要远古文化遗存、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闪烁永恒之光。

“在即将迎来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启动仰韶村遗址第4次考古发掘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刘海旺说。

漫步仰韶村,记者看见,集遗址保护展示、考古体验、观光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仰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据了解,在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之际,这个别具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向公众开放。



仰韶文化博物馆(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